

凭窗读史

曹雪芹和徐志摩两代文学巨擘于此居住教习、诗化生活

西单街区的历史流变与文脉

随着北京西单商场全面启动更新改建升级工程,西单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明清之际,西长安街附近大理寺、太仆寺、太常寺、刑部、都察院、奎仪卫等衙署的采办,多以西单为主,推动了西单商业街的发展。官宦名臣、文人墨客诸如明成祖朱棣的谋士姚广孝,两代名相李贤和李东阳,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等都曾住在这一带的街巷里。种植在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距今已六百多年的“京都古枣第一株”,还见证了曹雪芹和徐志摩两代文学巨擘与友人相聚的场景。

诚如斯,北京西单成为集古街风情与购物胜地于一体的热门旅游街区。



徐志摩



刘春霖

“西单”二字之由来

西单全称西单牌楼。明代在今西单十字路口处建有一座牌楼,额曰“瞻云”,《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单牌楼。因地处皇城西部,时称西单牌楼。相对西单牌楼,在今东单十字路口处,也建有单牌楼,称东单牌楼,额曰“就日”。从这两处题额的字面解释,表示东看日出,西望彩云。深一层含意,取典《史记·五帝本纪》:“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意思为贤明的君主恩泽施及尤民。范仲淹《明堂赋》:“望云而就日,歌尧而颂舜”,说的是民心向往皇帝,感受皇帝龙恩。

西单牌楼与东单牌楼,均为形式相同的三间四柱三楼冲天式木牌楼,位置南北向。1916年,袁世凯将西单牌楼额名改为“庆云”,东单牌楼额名改为“景星”。1923年,两牌楼因妨碍交通而被拆除,以后仅剩地名。大约到了20世纪30年代,老北京人渐渐省去了“牌楼”两字,就只说西单、东单了。东、西是方位词,“单”字意为一座牌楼。作为西单的地标性建筑,2008年西城区政府改建西单文化广场,在原牌楼偏东北处按一点三倍比例复建,牌楼题额仍为“瞻云”二字。

“东富西贵”豪宅云集

老北京有句俗语,叫“东富西贵”。西贵指过去西城多王府,其实当年住在东城的权贵并不少。话说从前,旧时西城有钱人家也不比东城少。不过在西单地区,的确住过多位王爷和高官显贵。西单北大街附近,便曾建有郑亲王府、礼亲王府、洵贝勒府、定亲王府、绵德府等多座王府。

郑亲王府在西单北大街西侧的大木仓胡同,胡同原名打磨厂,后演变为大木厂、大木仓。郑亲王府第一任主人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弟的第六子。顺治四年(1647年),济尔哈朗因建府超过规定,又借越擅用铜狮、龟、鹤等,遭弹劾被罢议政并罚银两千两。咸丰死时郑亲王瑞华再受顾命,此后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瑞华被赐“自尽”,其弟肃顺被斩首菜市口。同治年间恢复郑亲王世爵,发还郑亲王府。民国年间,郑亲王后人将王府抵押给西什库教堂,借银两维持生计。经中国大学调解,由中国大学向比利时营业公司借十五万元偿还债务,郑王府成为中国大学校址。全国解放后,中国大学于1949年停办,这里成为教育部机关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在地,现为教育部所在地。

灵境胡同在西单北大街东侧,与大木仓胡同隔街相望,因胡同内建灵济宫而得名。胡同东西走向,西部因胡同南侧是宣城伯卫颢宅的后墙,又称宣城伯后墙街。据传,宣统帝师、太傅陈宝琛曾住此,每天进宫为小溥仪授课。1949年后,灵境胡同与东段黄城根合并,统称今名。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皇帝朱棣患病,梦见南唐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谔二兄弟前来授药,不日其病即愈。于是皇帝命建官祭祀,封其为玉阙真人、金阙真人,赐额灵济宫。崇祯年间,以两位真人是叛臣之子为由停止祭祀活动,从此灵济宫衰落。目前灵境胡同最宽处32.18米,全长664米,被称为北京最宽的胡同。

灵济宫前原名旧灰厂,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此设西厂。西厂是明朝特有的官署名称,直接听命于皇帝,全称“西缉事厂”。汪直以西厂为据点,勾结朝官结党,有秘密捕人、杀人之特权,引起朝野反对,后西厂被撤销。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恢复西厂,五年后因刘瑾倒台遭凌迟而撤销。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总统府设在中南海,将总统府西侧的灰厂夹道改名府右街。当时,府右街南半部为皇城,北半部为中南海的一部分,南北不能通行。今灵境胡同东段住北的一片地带,早年都是皇城的范围。1921年,府右街南口东侧建起私立四存中学,取“存学、

存性、存人、存治”之意,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并入北京市第八中学。

李阁老胡同在灵境胡同南侧,今名力学胡同,东起府右街,西至横二条。明孝宗时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赐第在此而得名,后沿用。阁老是一种尊称,历史上阁老之称最早见于唐代,武则天时任狄仁杰被封为凤台阁尚书同平章事,官位相当于宰相,故称阁老。明清时,泛指称内阁大学士。李阁老胡同内住过两位阁老,一位是明英宗,宪宗时的一代名相李贤,其举贤任能,以惜人才开言路为急务,为人耿介忠直,英宗遇事必召李贤。稍晚另一位阁老名李东阳,明朝天顺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因年长而称阁长。立朝五十载,清廉不渝,谥号文正。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史料笔记《长安客话》载:“李文正东阳赐第,在灰厂小巷李阁老胡同。”灰厂小巷,即今府右街。看来李东阳赐第前,已有李阁老胡同。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一月,京师大学堂在李阁老胡同西段增设“进士馆”,培养新进士成为“果、达、艺”的优秀从政人才,清代末科状元刘春霖曾入馆学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诏准废除科举制,进士馆改为“京师政法学堂”,后又改为北平大学法学院。

徐志摩的“世外桃源”

小石虎胡同在西单北大街东侧,东西走向,明称石虎胡同,因胡同内古庙前有石虎而得名。石虎为古代墓前驱邪镇墓所用,阳宅前不能摆放,被认为是北京最神秘的胡同。胡同北侧有南北曲折走向的死胡同,名火匣子胡同,传统太平歌词“没有棺材,只有火匣子把他装”,老北京人说不吉利,后以谐音改称果匣胡同。1965年石虎胡同更名为小石虎胡同,将果匣胡同并入,果匣胡同的名字从地图中消失。2018年北京恢复了多条老胡同的旧名,果匣胡同重现天日。

小石虎胡同7号院(今31号),明初为常州会馆,是京城最早的会馆之一,后成为明末崇祯朝大学士周延儒宅邸。周延儒,字玉绳,崇祯年间的内阁首辅之一。在督师堵截清军时不指挥作战,却不断谎报军情,声称连战皆捷。后真相被揭露,勒令自尽,清修《明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民间有歌谣唱道:“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

清初这里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皇太极把十四女恪纯公主下嫁给他,称“驸马府”,又称“恪纯公主府”。后吴三桂反清,吴应熊和其次子被康熙诛杀。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为培养宗室子弟,分设左右两翼宗学,右翼宗学即设于此,曹雪芹曾住此并任教习,并认识了敦敏、敦诚两兄弟(努尔哈赤第

十二子英亲王爱新觉罗·阿济格五世孙)。敦诚后来在《寄怀曹雪芹》一诗中,写道: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此处“虎门”即指右翼宗学。

一百多年后的民国时期,曹雪芹居住过的这处院落迎来另一位文豪。上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倡议设立松坡(蔡锷)图书馆,小石虎胡同设立有分馆。中国近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徐志摩居于此,并担任松坡图书馆外文书英文秘书,同时他发起成立俱乐部组织聚餐作诗,梁启超、胡适、陈西滢、林徽因、林语堂、林长民等文艺界达人均有参加,后来规模壮大,结为“新月社”。有人说,这里是徐志摩的世外桃源,因为那小庭院里有他的理想人生——诗化生活。

中华一脉 同心筑梦

小石虎胡同8号院(今33号),清代授给乾隆长孙贝子绵德居住,又称南府;缸瓦市定亲王府居住着绵德的弟弟绵恩,称北府。绵德去世后,他的后人一直居住于府中。清朝末年,府邸由绵德的玄孙毓祥继承,因袭辅国公,又称毓公府。民国后该宅被收为“官产”,归财政部官产处管理。北院有棵15米高的古枣树,树干周长达2.85米,距今已六百多年,人称“京都古枣第一株”。

1913年,蒙藏学校在西皇城根转马台孙家花园成立。1916年,蒙藏学校搬至西单小石虎胡同,租用北洋政府官产处石虎胡同8号原毓公府,后又购入石虎胡同7号,将此二者拆除隔墙合并为学校校址。这里的教学摒弃封建教育体系,创立新学,开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先河,并有针对性通过课程、课外读书、名人演讲与各类纪念日活动,对个人加以训诫,促进学生“中华民族”意识的萌发与认同。

彼时,蒙藏学校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标志性场所,是党成立初期开展民族工作的主要阵地。上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黄日葵等共产党人经常到蒙藏学校开展革命工作,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毫不夸张地说,蒙藏学校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摇篮。1951年,这里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2006年,蒙藏学校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3年3月,修缮一新的蒙藏学校旧址暨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对外开放,成功举办了“中华一脉同心筑梦——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主题展”和“蒙藏学校旧址专题展”。悠久的历史由中华民族共同书写,灿烂的文化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惟有铸牢中华魂,才能构筑中华一脉的精神家园。

北日



1952年位于西单的长安大戏院。

郁达夫笔下的鲁迅“细节”

与鲁迅有过直接接触,写出最好纪念文章者,女性自然是萧红;男性应该是郁达夫。

“几句哀悼的话”

1936年十月鲁迅逝世,正在福建的郁达夫从一位日本记者处获得消息,起初并不相信,因为不久前,他与鲁迅在上海见面,两人还相约同去留学过的日本“看红叶”的,可随即多个渠道证实了消息。他立即在一张报纸稿上,写下几句电文:“上海申报特译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一早,郁达夫踏上一艘轮船,奔回上海。

郁达夫参与和见到的鲁迅丧事,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工人、学生、妇女团体,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著作、受他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数在一万人以上。当时,人们写出了大量与鲁迅相关的纪念文字,可与鲁迅有深交的郁达夫“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在这一个热闹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他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这似乎不经意的“哀悼的话”,却包含了后来人常常引述的名句。

文章发表时题目为《怀鲁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这篇文章不过两三百字,可内容却因凝练而足够分量。“这不是寻常的哀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鲁迅的灵柩,在夜明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当时纪念鲁迅逝世的文字中,这应该可算是最好的篇章。

关于鲁迅的文与人

接下来的几年,郁达夫先后写出了《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回忆鲁迅》《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以及用日文所作《鲁迅の伟大》等文字,如果加上他之前论述鲁迅文字的数字篇文章,可以说,他是当时写得最多、质量最高纪念鲁迅文章者之一。他的这些文章,不仅因为友谊,更因为他自己亦为著名作家,眼光高远,写出了鲁迅光辉而朴实的多面。这些内容,至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无疑,鲁迅首先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突出在何处?对此,郁达夫有高妙解读:“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同的。”

鲁迅的文字,颇多刻薄。表层看去,似乎冷硬,对此,郁达夫也有精确剖析:“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当……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着,却正是一腔热血,一股热情,这一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得出来。”

文字之外,关于鲁迅的形象,郁达夫如此写道:“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儿。”“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写鲁迅的笑时,郁达夫的描绘连带上“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一下就不一般了起来。

亲近鲁迅者都知道,他喜欢讲笑话。郁达夫第一次也感受到了:“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向寓舍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鲁迅甚至与郁达夫谈及他们兄弟的不睦:“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按:周作人),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汇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到一二成了。”鲁迅兄弟由最早的和睦融融到后来的反目,一直是鲁迅研读的追索课题。后来人多有猜度,可郁达夫很早引用的鲁迅的话,引起的重视却不够。

高明作家观察人物

郁达夫近距离接触鲁迅,许多事,他身为作家,都曾细细留意细节:“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得扮官不可。”这是鲁迅的幽默说辞。可他做事呢?——“他虽则不够的说,但做到



1936年去世前十一日的鲁迅。

无论什么事情时,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古人云:听其言而观其行。郁达夫把两面都指出,鲁迅先生的面貌就浮现了。

当时的娱乐,主要在戏曲。可据郁达夫讲:“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欧阳)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这些言论,或许可以说鲁迅偏颇,可又不能不承认他见解的别出新意。

从一般的描述中,我们以为鲁迅总是严正的。郁达夫却举例:“对于目连戏(鲁迅家乡戏剧),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地做出来给我们看过。”鲁迅居然还扮演过这等角色给人看,实令一般读者怎么也想不到。

说起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郁达夫描绘得也有味:“从厦门大学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中午,就约他和景宋女士(许广平)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在吃完饭后,茶房端来咖啡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诚亲属似的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密斯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在这个极微细的告诚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中国俗语,看破不说破。有一次,林语堂和郁达夫去看鲁迅,说了半天话出来,林语堂忽然问郁达夫:“鲁迅与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郁达夫“只是笑着摇摇头,回他说:‘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按照郁达夫的说法,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绝不疑心有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他便听信了郁达夫:“语堂自从那一回经我说过鲁迅和许女士之间大约并没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直到海婴(鲁迅的儿子)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我对我说破了,他满脸泛着想好好先生的微笑说:‘你这个人真坏!’”这节趣事,若无郁达夫记载,应该也少有人知了。

鲁迅抽烟的程度如何?很多读者都不知。郁达夫对此也有观察:“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支,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得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郁达夫是高明的作家,对于这样一些有时可以透露人物深切内心的细节,经他观察描写出来,值得人们体会。

杰出作家的着落落笔

作为精神先驱,鲁迅当然有对终极的思考。他是如何的表现呢?对此,郁达夫也通过一桩细事有所透露。他说鲁迅的书斋,无论何时,总整理得“必清必楚”,自己一次去鲁迅那里,见到刚开始说话的海婴也在书房:“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到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说:我死了之后,这些书他问我们死他的’。”在国人情俗中,这话是有忌讳的,连郁达夫也这样想:“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最为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死’这一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起的。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可是“死”终于来了。与现实的对比是:“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较得难耐。”

不曾见到有人这样写鲁迅及孩子的,可从常理人性现实读去,又真切得无以复加。鲁迅的“自然”,孩子的幼稚,又呈现出伟大生命的寻常姿态。着眼落笔于此,也体现了郁达夫的不一一般之处。文笔毋庸说,更重要的是这些易被忽略的精细细节,通过阅读体会,我们也可以学习名家是如何调动飞扬思绪、运用内在理路,写出特色文章的。

杨建民